

国家公园: 保护与发展协同推进

● 云南日报记者 王丹 胡晓蓉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为世人描绘了一方世外桃源:日照金山的雪峰,巧夺天工的峡谷、茂密的原始森林与繁花似锦的草甸,以及明镜一般的高原湖泊。在这里,多民族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生,代表“遥远而迷人”的“香格里拉”成为无数人心中向往的地方。

这样的场景,真实地存在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境内海拔3800米的高山密林中。碧塔海与属都湖相伴而卧,“杜鹃醉鱼”和“熊捞醉鱼”奇观为人乐道,湖岸边牧场炊烟袅袅、牛铃悠扬,丰富的珍稀动植物种类和浓郁的藏乡游牧风情绘就美丽图景,定格于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中。

自1996年在中国大陆率先开展国家公园新型保护地模式探索以来,云南省先行先试,经过20余年的努力,国家公园模式成为云南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共识,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出台顶层设计政策贡献了云南经验和智慧。

如今,云南省把国家公园体制探索作为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建设中国最美丽省份的具体行动,拟建高黎贡山国家公园的综合科学考察、社会影响评估正在扎实开展,西双版纳雨林(亚洲象)国家公园、无量山—哀牢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准备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公园探索的路上,云南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破冰: 从普达措出发

2001年,面对升级自然保护区的机会时,迪庆藏族自治州曾举棋不定:是将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申报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更严密的保护?还是维持现状,让周边村民继续保有生态旅游带来的收入?

这一道关于保护和发展的博弈难题,不仅存在于碧塔海,同样横亘在全国各级自然保护区面前。“有一种办法可以平衡保护与发展。”在主持和参与了云南多个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科考和总体规划后,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教授杨宇明认为,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率先引入的“国家公园”发展理念或将成为突破口。

“滇西北的‘三江并流’地区,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被列为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然而,滇西北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丰富,却也十分脆弱,加之经济贫困,承受着保护和发展双重压力。”杨宇明介绍。

1996年,云南省开始了在滇西北基于国家公园建设新型保护地模式探索研究,由云南省发改委、中科院昆明分院等机构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开展了滇西北大国家公园项目的前期研究。2005年5月,由省府研究室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共同组织,邀请了迪庆州政府、原中甸县林业局等政府部门和清华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的专家及相关机构参加,在昆明举办

了关于在香格里拉创建国家公园的研讨会。

2006年,在滇西北旅游现场办公会上,省政府正式作出了在滇西北创建国家公园的战略部署,并将“探索建立国家公园新型生态保护模式”列为我省生态环境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同年在西南林业大学成立了国家公园发展研究所,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开始了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创建工作。

创建过程中,省政府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开展了包括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法规、准入制度、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专项研究,规划将国家公园建设成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景观、湿地景观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的典范,建设成为向公众提供休闲观光和体验自然的最佳场所,实现对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物、地理和人文资源及景观的科学保护和开发。

迪庆州以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为依托,扩大保护范围,整合建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2007年6月,普达措国家公园正式挂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总面积60210公顷的普达措国家公园,包括了碧塔海闭合型高原湖泊周围汇水面山茂密的寒温性针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杜鹃灌丛、五花草甸——沼泽湿地与湖泊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资源等完整的复合生态系统,以及古冰川遗迹和传统村落民族文化等历史文化遗迹都纳入了国家公园的重要保护对象和主要管理目标。

2016年,云南正式启动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同年出台了中国大陆首部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成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立法引领改革的典范”。

经过5年试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全面完成,并在构建较为完备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探索贫困地区国家公园发展的自养模式、形成融合传统生态智慧的内生型国家公园生态管理方式、充实“造血式”的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机制等方面,为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

共赢: 在保护与发展中走向未来

目前,全国共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其中我省有普达措国家公园一处。而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入口,云南省也已成为大陆最早开始尝试探索国家公园建设的省份。建立国家公园就是要将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起来,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给予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这是世界专家普遍的共识。经过多年建设,云南的国家公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民生、统筹推进保护与发展等方面均取得成效。

作为全球单位面积内生态系统类型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普达措国家公园保持着极高的生态系统原真性与完整性。国家公园试点开展以来,区域内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明显改善,云杉、冷杉林等顶级生物群落维持稳定,健康的天然林面积占比高达88.04%,人工生态系统仅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3.15%,人口和公路密度远低于所在生物地理区的平均水平。从未发生过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保持一级。主要保护物种生境质量稳步提升,种群数量得以恢复性增长。核心保护区无居民聚集点和开发经营项目,全域不存在显著的生态退化现象。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迪庆州曾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是“同一战场”上的“两场攻坚战”。普达措国家公园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展资源的非消耗性利用,并以此反哺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形成了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通过国家公园带动,数千名原住民参与生态管护、巡护监测、访客服务、交通、教育等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实现生态保护、理念得转变,贫困群众得增收,户均年收入从2万元增加到10余万元,绿色已成为保护与发展协同推进的最美底色,生态、社区、原住民发展面貌焕然一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得到生动实践。

普达措在藏语中是“普度众生到达彼岸之舟湖”的意思,普达措国家公园以此为名,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公园建设,为公众提供普惠的民生福祉。普达措国家公园坚持共建共享,广泛吸纳企业、社区、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国家公园保护、建设与管理,积极探索全民参与生态保护,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试点以来,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生态状况显著改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高达每年43.7亿元,得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公园协会等国际组织的充分肯定。同时,普达措国家公园深入实施全民公益理念,将门票价格从每人每次138元降至每人每次20元,年均约125万人次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学习自然的机会,充分让各族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福祉,深刻领略普达措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和谐之美、发展之美,形成了保护自然的自觉意识,树立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良好形象。

地处长江、怒江、澜沧江、珠江等主要河流上游或者源头的云南是我国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发挥云南重要而特殊的生态作用,为美丽中国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是云南长期探索和思考的历史命题,着力构建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云南在深入的探索中,不断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一颗印: 遗落昆明老城的一颗明珠

◇ 钱国宏文/图

走过全国许多地方,对国内的一些建筑模式非常感兴趣,如陕北的窑洞、云贵的竹楼、北京的四合院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昆明的一种古老建筑格局:“一颗印”。

“一颗印”,单听这种称谓,就已经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了。什么样的建筑格局叫做“一颗印”呢?在昆明旅游期间,我非常关注“一颗印”,有意识地游览了昆明地区“一颗印”集中的地区。“一颗印”是云南昆明地区汉族、彝族普遍采用的一种住屋形式,类似于北京的四合院住宅:毗连式“三正四耳”,即正房三间,耳房东西各两间,有些还在正房对面,即进门处建有倒座。中间为住宅大门,四周房屋都是两层,天井围在中央,住宅外面都用高墙,一般无窗,主要是为了挡风沙和安全。整个宅院外观方方正正,远观和俯瞰,均如一块印章“盖”在地上,所以当地人俗称这种建筑格局为“一颗印”。

对于“老昆明人”来说,“一颗印”是最能拨动他们内心深处怀旧情愫的一种建筑载体。我在昆明一些老街巷游览时,感觉昆明人一度怀

有矛盾的心理:一面承接汹涌而来的现代社会发展浪潮,兴建了好多现代化的商贸建筑;一面又眷守着祖宗留下来的“一颗印”,迟迟不肯丢弃。比如在东寺街,上个世纪这里还有一片“一颗印”建筑,但随着近年来城市发展,原来的老建筑已消失在现代繁华的商贸区影子里。望着鳞次栉比的商铺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老昆明人”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滋味。

值得欣慰的是,我在昆明市内顺城街,看到了很多“一颗印”老建筑。当时游客稀少,正适宜我慢慢地欣赏和品味。我信步推开一幢院门,探身“一颗印”的奥秘。院主人是一位穿着蓝衣、噙着长烟杆的长者,老人家听说我对当地建筑感兴趣,热情地领我到每个屋子转一转,同时介绍家里各种建筑构件的文化背景。这是一栋传统的“一颗印”,建筑格局采用的是“三正四耳”:三间正房。整个院落坐北朝南,门内有门,大门照壁上方残留着彩画,依稀可辨是“松菊梅兰”。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院落,迎面正中央是院中的“天井”,井台四周砌有条石且铺有石板。多年的风雨

侵蚀,使条石和青石板上长满了青苔,光滑反光。廊阶下铺的是青石板,约4米长、1米宽。院子是两层穿斗式木结构小楼。正房底层中央一间是“客堂”,专用来接待客人用,左右为主人的卧室;东西两侧为耳房,耳房底层分别是厨房和牲畜栏圈。楼上正房中间是祭祀祖宗的“祖堂”,其余房间用于居住和储存粮食。堂屋门前挂有木匾,雕刻非常精美,有人物、花鸟,也有一些汉字,但由于年代久远,已辨不清字迹。走进屋内,地面铺着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筑就的“三合泥”,平整、光亮、不打滑,凉爽、结实、不潮湿。厅堂、居室、木雕、格扇、栏杆制作工艺均非常精巧,图案丰富,寓意“福禄寿禧、封侯拜相”。

我坐在天井当院,边与老人闲聊边四下打量整个院落。院落的大门居中而设,门内有倒座或门廊,倒座深八尺,“三间四耳倒八尺”是“一颗印”的最典型的格局。相对于正房和耳房而言,天井较为狭小,这也是为了有效利用空间。正房和耳房面向天井的方向,都挑出了“腰檐”——刚才看得粗略,没有注意:正房的“腰檐”称作“大厦”,耳房的“腰檐”和门廊的“腰檐”称作“小厦”。大小厦是连通的,便于人们雨天穿行而不会被淋到。整个院落房屋高,天井小,大小厦深挑,可有效避免强光直射,而正房和耳房的双坡顶设计,则有利于防风、防火、防盗,外墙高耸,远观如欧式城堡一般!听罢老人介绍,我更加叹服于昆明人的精巧与智慧。

在昆明小住的日子里,我又到回民街转了转。回民街内的很多老铺子还是过去的老样子,没有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临街院落的“一颗印”建筑也有一些,从街上走过,各式各样的雕花木窗映入眼帘,我很喜欢这种因岁月剥蚀而显出的沧桑感,它至少是一种文化的古老印记。在回民街我遇到一位中年人,他正在装修家中老房子。他说他收购了一些老式门窗建筑物,来装修老房子,这里是他们世代的家,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他们自己不能丢了自己的根。老哥的话说得很朴实,我听到了话中的隐义:坚守固有的民族文化,让它消失得尽可能慢一些。虽然“一颗印”在昆明已越来越少,但我坚信:在昆明人心中,永远驻留着闪烁着古朴光芒的“一颗印”!



昆明现存的老宅。

雨崩见闻

◇ 江初文/图



▲ 犹如世外桃源的雨崩下村。



▲ 雨崩村内具有藏民族文化特色的客栈深受游客欢迎。

位于德钦县云岭乡的雨崩村,以世外桃源般的风光令人神往,而旅游开发也使雨崩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庆假期笔者走进雨崩村,昔日泥泞的道路已被平整清洁的卫生路取代,客栈、餐厅在村头巷尾随处可见,还有奶茶店等时尚的小店。曾经封闭的雨崩一年难得有几个外地人,现在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游客挤满了村里的客栈,还有行人背着相机在村口拍照。

雨崩村雪山环绕,森林、草甸间牛羊、骡马点缀其中,加上被当地人誉为圣水的雨崩神瀑,身临其间,给人一种置身于童话世界般的浪漫感觉。

与笔者同行的还有两名来自南京的游客,他们是第一次来雨崩,准备多待几天,想看看神瀑、冰湖。雨崩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老百姓收入上。曾经的雨崩是德钦县最为偏僻贫穷的村落,村民堆此里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爷爷背着自己制作的牛皮绳去外面村子换粮食的经历,一去一回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如今,随着旅游业发展,堆此里家也富起来,他自己买了两辆皮卡车用来跑运输,父辈们外出一次要一个星期的故事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现在我们村的客栈、餐厅基本都包给外地人,本地人按年收取租金。”雨崩村民斯那尼玛介绍。斯那

尼玛家的客栈承包给外地客商,他每年可以收取近20万元的承包费。据他介绍,村里收入最多的人家每年租金有60多万元。

雨崩的变化还体现在生态环境上。在村里,记者遇到了当地的劳登大叔,随着这些年生态环境改善,原来远离人群的猴子、鹿、熊等动物又回来了,“现在包谷地都被它们糟蹋了,有时还对着我们龇牙咧嘴!”大叔笑着说。笔者听着很新奇,也许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最好的诠释。

雨崩村的游客越来越多,客栈如雨春笋般不断新建,如何统筹保护与发展成为了雨崩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德钦县多次组成工作组进驻雨崩村,明令禁止无节制的开发,并且制定出台了详细的措施,在开发同时做好保护。

在富起来的同时,如何可持续发展将是雨崩今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曾经进入雨崩需要徒步或骑马,现在有了简易的道路,汽车喇叭声响彻山林,过去需要6、7个小时的脚程现在只要不到30分钟的车程,许多游客都会选择乘车进入雨崩,也有一些人依然选择徒步以便进行更深度体验。但是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笔者希望还是能多一些“糟蹋庄稼”的生灵,少一些机械的轰鸣,让自然的雨崩村永远保持这份宁静和原始。

大花红景天



大花红景天,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横断山—喜马拉雅山脉海拔4000—5000米的高山灌丛及流石滩。花期6—7月。模式标本采自锡金。图片摄于香格里拉市红山铜矿。(方震东摄)

